

一九六七年比利時共黨活動概況

畢芳隆著
袁開顯譯

比利時根特
大學教授

一 前言

在沒有研究比利時共產黨的政治活動以前，先用簡明的統計數字，說明它在比利時的地位及其消長歷史：

選舉年度	共黨候選人 得票數	得票之 百分比	當選國會 議員數
一九二一	九三九	〇·〇五	〇
一九二五	三四、一四九	一·六四	二
一九二九	四三、二三七	一·九五	一
一九三二	六五、六九四	二·八一	三
一九三六	一四三、二二三	六·〇六	九
一九三九	一二五、四二八	五·三六	九
一九四六	三〇〇、〇九九	一二·六八	二三
一九四九	三七六、七六五	七·四八	一二
一九五〇	二三四、五四一	四·七四	七
一九五四	一八四、一〇八	三·五七	四
一九五八	一〇〇、一四三	一·八九	二
一九六一	一六二、二三八	三·〇八	五
一九六五	二三六、七二一	四·五六	五
一九六八		三·三〇	五

比利時共黨在一九四六年戰後初期所獲的勝利，可能是由於反納粹佔領所組成之聯合陣線留下的影響。當時比利時共黨標榜只有他們是反納粹鬥士的黨，是被納粹屠殺者的黨，以及戰爭犧牲者的黨而獲利；而且在納粹佔領

的後期數年中，藉反納粹運動為名，收到大量的金錢，使其能用以在比利時發動空前的全國性競選活動。

在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間，由於比利時王室問題所引起的政治危機，舉行特別及提前的選舉；而在比利時的歷史中，一九四九年是第一次婦女參加投票。這一選舉民主化的結果，使選民人數倍增。惟共黨並未因而獲得利益，甚至連上次選舉所獲得的百分比亦無法維持。其所獲選票絕對數的比例，遠低於選民的增加數。因而共黨在國會中的席數，亦由廿三席降為十二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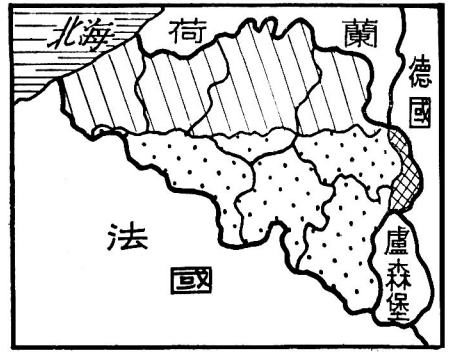
共黨所佔百分比，通常為百分之三與四之間。一九六一年所獲席數急增，乃是由於在一九六〇—六一年冬天罷工期間，與社會黨組成聯合陣線的結果，針對艾斯肯斯(Eyskens)之基督教社會黨及自由進步黨聯合政府所提之團結法案所致。

吾人可作如此的估計，目前比利時共黨在國會的表數，較正常狀態下稍多。而且所當選的議員，全是窩龍人，是代表窩龍(Wallon)各選區的，即：

列日(Liege)選區	二席
蒙市(Mons)選區	一席
夏里洛亞(Charleroi)選區	一席
杜爾奈(Tournai)選區	一席

在比利時弗郎地(Flanders)區，共黨從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國會議員任期中，連一個席次都無法獲得。由於其預料選舉結果之不利，連候選人的名單也提不出來。

選舉揭曉後，曾企圖以不同的組合，將斯柏克及雷弗拉(Spaak—Lef-



▨ 比利時弗郎地語區

▩ 比利時窩龍語區(法語)

▧ 比利時德語區

與基督社會黨的內閣一樣，是一個托辣斯、反動派、資本主義，及美國人的內閣。

比利時共黨對這一自由進步黨與基督社會黨聯合內閣的態度，可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第十七屆黨員大會的最後決議中見其一斑；而其一九六七年的政策，是在不顧未來演變及有限經費的情形下，決定其工作計劃的。

在上述決議中，共黨將此內閣形容為『夜長夢多的』，『無能的』及『麻木』的內閣，並主張將政治活動從政黨轉移於各種工會。關於此點，吾人須明白共黨在比利時，是沒有自己的工會的。所有共產黨員及其同情份子，只是比利時總工會中社會黨的黨員。在此總工會中，共黨控制着若干主要職位。而且許多年來，總工會中的社會黨與基督社會黨，均行動一致。照共黨的看法，將政治活動從政黨轉移到工會去，結果將使它與社會黨及基督社會黨形成一永久性的聯合陣線，採一致的行動，因為此三者無論在地方階層或企業階層都是利害一致的。依照該決議，此一結合，雖有『理論歧見』，亦能實現。

然而，這一偶爾有效的共同行動陣線，並未產生如共黨所預期及所堅持的工人陣線『民主化』的效果。

若干年來，比利時共黨一直從事於弗郎地運動及窩龍運動，尤其是主張弗郎地與窩龍民族主義之復活。在納粹佔領最初數年，由於共黨與納粹勾結

一九六七年比利時共黨活動概況

，此二項運動，受到莫大的挫折。戰爭結束後，通常都避免用『弗郎地民族主義』一辭，而運動則以『聯邦主義』之名代之。關於此點，該決議對於窩龍反動份子不能分化窩龍聯邦運動（窩龍人民運動）及工人運動，以及在弗郎地（弗郎地人民運動）聯邦主義者，已脫離了聯合黨（社會黨及基督社會黨）及弗郎地民族主義人民同盟的死硬派二事，表示滿意。共黨所不能控制的民族主義運動，就指為『死硬派』。

照共黨的說法：這一內閣，如同一九六〇年艾斯肯斯自由進步黨一內閣，如同一九六〇年艾斯肯斯自由進步黨與基督社會黨聯合內閣的態度的關係，可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第十七屆黨員大會的最後決議中見其一斑；而其一九六七年的政策，是在不顧未來演變及有限經費的情形下，決定其工作計劃的。

因此，比利時共黨，為一九六七年擬訂三大目標：

一、修正比利時的外交政策，以取銷軍事集團制度，使比利時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採取獨特及大膽的行動，終結美國在越南的侵略，建立一個歐洲共同安全系統。

二、為窩龍、弗郎地及布魯塞爾提供民主的聯邦措施，舉行公民投票，與羣衆作更廣泛的接觸，促使憲法及政治制度的民主化。

三、採取更多的主動，以保障職業，俾達到羣衆的總動員。

為達到上述目的，共黨要求對比利時社會黨的右翼份子進行鬥爭，要求真正的工人民主，發動對現行社會主義理論的批評。這一理論，據共黨主張，乃分化工人及維護階級合作的工具。

共黨希望使工會工人運動放棄與獨佔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和平關係，尤其特別說服比利時社會黨及基督社會黨中的基督民主派，走更左的路線。共黨此舉，意在組成一包涵更廣泛的空前聯合陣線。

它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黨員大會之決議中宣稱：比利時的大多數人，都贊同上述計劃的實施，惟以現行制度阻止此潛伏的大多數作政治活動而已。

該決議最後引用一九六五年二月，蘇俄共黨第廿屆會議中黑魯曉夫所言：『新的可能性是不斷出現的』，只是黨來不及從這些可能性中獲致明確的結果，尤其是將共產理論灌輸到基督社會黨羣中去爲然。該決議要求以民主方法，充分利用此不斷出現的可能性，宣揚一種適合民主工人集團的理論。

二 一九六七年比利時共黨主要會議

三月十八—十九日：在根特（Ghent）大學學生之家，舉行共黨學生大會。

三月十九日：在杜爾奈，舉行窩龍區聯邦大會。

四月二日：在安特華普（Antwerp），舉行弗郎地地區聯邦大會。

四月七日：舉行聯邦好戰份子會議。

四月十五—十六日：中央委員會。

十月廿四日：恩內斯特·賓尼爾（Ernest Burnelle）在無線電台廣播，反對政府現行各項政策。

十一月十八—十九日：在布魯塞爾，舉行青年共黨大會。

十二月十六—十七日：在布魯塞爾舉行共黨大會。

三 最新的舉動

從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起，共產黨出版一教師定期刊物『共產教育者』（L'Enseignant Communiste）。

從一九六七年二月起，親北平的共黨，出版一雙月畫刊『爲人民服務之文化』（Culture au Service du Peuple），並用以刊登共黨所經營的『布魯塞爾人民戲院』的廣告，同時開辦一所半公開式的書店：『國際書店』（Le Livre International）。此派共黨，且負責分發關於美國在越南『暴行』之畫刊『越南』（Vietnam），以及河內出版之週刊航空版『越南快報』（Le Courrier du Vietnam）。

從六月起，窩龍共黨出版一法文月刊，作爲窩龍共黨的機關報，但迄今尚未能用弗郎地語出版同類刊物，可能是由於黨員太少所致。該月刊叫做『被剝削者』（L'Exploit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雅谷莫特 Jaquemotte 所創立之左傾社會主義者機關報原名）。該刊立場，甚至較北平同路人更爲左傾。

比利時共黨在比利時各主要城市自營書店，從一九六六年三月起，出版一本名叫『弗郎地民族主義』（Vlaams Marxistisch Tijdschrift）定期刊物，此刊物雖然不是共黨正式機關報，但刊載了許多著名共黨領袖所投的稿件，其目的是在增進共黨、社會黨，及基督社會黨民主派間的理論，是一本頗爲成功的季刊。

另一種增進理論的方法，是組織公開的小組討論會，將討論經過公佈，以法語爲多，用弗郎地語較少。羅馬天主教教士及基督社會黨工人團體領袖，經常參加此類小組討論，通常在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禮堂內舉行。這些舉動都是由『公共教育團體』發起和控制的。此一團體，則受共黨控制，有其不可低估的影響力，尤以對布魯塞爾各界爲然。上述各種刊物，不應與『比利時共黨刊物』互混，因爲後者在理論的發揮方面較少彈性，而稿件完全是由傑出的共黨人物所撰寫。親北平共黨所出版的小冊子不多見，亦不大爲人重視。其週刊『人民之聲』（La Voix du Peuple），以攻擊莫斯科修正主義爲主。

四 比利時共黨的國內政策

共黨國內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欲與社會黨及基督社會黨的各種工會，建立一行動一致的陣線，但未能達到目的。它利用一切機會，爭取在基層、企業界，以及各地市政府中，兩黨有份份子的合作。在一九六七年間，出現許多與這些有力份子合作機會。例如當時比利時社會黨是反對自由進步黨及基督社會黨所組成的聯合內閣的，第一次鬥爭是當政府因應付經濟危機而要求特別權力時，共黨在國會份子，不斷要求社會黨合作攻擊政府，而以較溫和的措辭，責備社會黨的反對行動太軟弱。另一事件，是共黨最近在國家階層所推行的聯邦主義。這問題，是弗郎地民族主義者，在上次大戰以前就提出

的；但當時弗郎地運動大多數代表，由於在納粹佔領期間，被說服與納粹合作，故在解放後，處境非常尷尬，毫無力量。共黨的企圖是很明顯的，在窩龍區，他們代表聯邦主義，以拯救經濟的不景氣。在共黨刊物及弗郎地同情者的著作中，共黨企圖放棄其視弗郎地運動為『文化運動』的傳統觀點，並主張應以經濟運動代替，而將弗郎地人民的解放，改在社會及經濟領域內求解決。所以共黨支援一切與弗郎地運動有關的舉動，並提供最新的理論原則。整個行動中心，都是針對魯汶天主教大學的各項問題。法律規定必須學習地區語言的魯汶位於弗郎地地區，但它的大學，以往都是只用法文講授，現在除了法文外，尚有一部份用弗郎地話。一九六六及六七年，共黨所有報紙，不斷主張該大學應分割為二，而將說法語部份遷到窩龍去。這一主張，會增加許多麻煩，現在無法詳加討論。比利時的天主教徒，恐此分割，會使大學瓦解，而該大學是全部共產黨徒所憎恨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共黨煽動一部份學生，參加農民示威遊行，以反對在奧登那特（Audegarde）地方『憲兵』的措施，將所有目前示威遊行的各種動機結合在一起：農民問題（土地徵用），國家科學研究基金及大學分割問題，領導者是受共黨理論影響很深的學生工會份子。

在國家階層另一手段，是加強所謂對天主教徒的理論灌輸，邀請各地前進的教士與傑出的共產黨員作公開討論。這樣，共黨吸引了大批用其他方法所不能獲得的聽眾，而給大家一種觀感，認為基督徒與馬克思主義者間的歧見，是何等的『不足道』！這種舉動，很能騙取輿論。更值得一提的是，是羅馬天主教會紅衣主教若瑟夫·卡典（Josef Cardijn），答應支持行動委員會，有關反對美國在越南政策的示威運動。在所有這些場合，共黨所下的正式命令，是將思想歧見加以隱藏，避而不談。每逢有一工廠關門，雖然完全合乎經濟要求，共黨以及基督社會黨及社會黨仍然發動示威遊行。關於此點，當然以窩龍及林堡（Limberg）為中心之礦產企業舉足輕重。其使人發生隱憂的事，可從示威遊行中看到。在這方面，共黨主張有關門之虞的工廠，應置於假扣押狀態下，改由政府派員控制。同時不願宣傳方面的矛盾，共黨對美國在弗郎地及窩龍的投資加以謾罵，認為是代表美元帝國主義及新殖民主義。生活費用稍微上升（在比利時，工資是按生活程度指數而調整的），便是共黨很好煽動的題材，而說生活指數是假造的。依它的主張，頭寸困難

及生活費用上升，整個問題應從大量削減國防開支及退出北大西洋公約而求解決。共黨支援大學學生，對政府修改獎金制度的抗議。在改變工人代表會議的社會選舉方面，共黨主張增強這些議會的權力，這等於使它變為真正的工廠蘇維埃。對此項主張，共黨企圖獲取社會黨工會的支援與合作。

除了獲得社會黨、天主教士及基督社會黨工會運動中若干例外人物的合作外，共黨不能達到它『行動一致陣線』的目標，非共團體對此類主張，都抱懷疑態度。不過許多政治家，發覺社會黨有明顯的左傾趨向，尤其是在國會中，社會黨份子，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設於比利時，以及當斯柏克退出政壇為然。

到此我們還可獲得另一結論：比利時共產黨，在理論範圍內，雖保持顯著的緘默，但却毫不放棄其任一思想教條。在一九六三年的政策計劃中，它仍然堅持其以往的目標；即摧毀資本主義社會，而代之以社會主義社會，作為達到共產社會的傳統步驟。欲達到此目的，共黨繼續從馬列主義中覓取靈感，並吸收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這些措施，都表現在一九六三年共黨政策計劃第一章中，且目前仍堅持其正確性。在和平共存的範圍內，共黨有時也使用不同的戰術，惟其最後目標是始終不變的。

五 比利時共黨的國外政策

上述對比利時共黨政策評論之真相，在其對外政策中，更為明顯。

任何城市投票贊成鼓勵人民參加『反原子遊行』的運動，共黨均予以支持。四月廿四日共黨國會議員珍·塔爾夫（Jean Tarteve），以及教士會會員顧爾（Goor）在安達列克（Anderlecht），主持一項大規模的會議，以討論此一問題，共黨且支持『世界和平理事會』所作的呼籲。

關於德國，共黨報紙對西德總理凱辛吉（Kiesinger）之訪問戴高樂，而大肆攻擊。所有共黨報紙，廣為討論及讚揚蘇俄關於在西德納粹主義復活問題，向美、英、法政府所提出的照會。共黨報紙要求西德承認德國共產黨，並要求波昂不加入為和平用途之原子能生產。對波昂政府仍然拒絕以奧德—尼斯（Oder-Neisse）作為明確境界一事，甚至在戴高樂於波蘭發表其轟動一時的聲明後，仍作全面的猛烈抨擊。

關於歐洲共同市場，共黨採取否定立場，同時反對所有增進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措施。

關於法國，共黨讚揚加拿大共黨支持戴高樂七月廿九日在魁北克所作的民族主義聲明，同時在另一方面，責備西方帝國主義者『利用民族主義分化社會主義集團』（七月廿九日）。共黨對法國共黨在各區選舉所獲的勝利非常高興，它將此項勝利歸功於與密大韓（Mitterand）左傾份子所組成的聯合陣線。

英國工黨工會對韋爾遜各種政策的態度，工黨部份黨員反對韋爾遜使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以及要求韋爾遜放棄親美政策，尤其是越南問題等，比利時共黨所有報紙，都是備加讚揚的。

共黨報紙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設在比利時一事，詳為報導且力加反對，認為國家頭寸不足，為總部人員子女所建立的特別學校，須負責任；同時共黨國會議員德魯摩斯（Drumaux），要求國會取銷為建築辦公大樓所用之四〇〇萬法郎貸款。共黨更進一步，抗議建築業工人之每週工作六十小時。當國家安全機構為一二五個視察單位招考人員時，共黨亦加抨擊，暗示政治迫害即將來臨。對在北大西洋公約總部附近所有銀行職員的政治背景加以調查一事，亦加責難。比利時外長漢姆爾對此問題的觀點，以及其改組北大西洋公約計劃，雖然共黨一知半解，亦加以批評與駁斥，最後共黨對『退出北約』（Quittons L'OTAN）口號亦大肆攻擊。按照他們的主張，應該締結一項歐洲集體安全的條約才對，而此條約宜包括蘇俄及所有歐洲共產國家。

關於波蘭，共黨是支持戈慕卡（Gomulka）的，他一點都不欣賞戴高樂作風。共黨對拉巴琪（Rapacki）訪問布魯塞爾，則加以讚揚。

關於東德，共黨認為是獨立而有主權的國家，要求給予外交承認，隨後又要求南北韓統一。共黨各團體曾組織共黨及社會黨國會議員東德聯合訪問團，且其報紙對來比錫的工業展覽大事宣傳。

西班牙工人和學生的罷工罷課，共黨報紙一致嘉許，並發起募款，以財政支援佛郎哥『恐怖統治』下的犧牲者。二月十一日，並在布魯塞爾組織示威遊行。

關於韓福瑞副總統訪問布魯塞爾，共黨組織了一個反歡迎示威遊行，舉

着『韓福瑞回家去』標語。共黨報紙每張都詳細地報導關於紐沃克（Newark）及越南事件的反美運動。共黨抗議在種族暴動中使用聯邦部隊，但較難理解的，是對美國在比利時投資的抗議（舊金山事件及在帝亞金 Diegem 設立國際商業計算機—BM研究中心）。

詹森總統用懲罰來威脅種族搗亂份子一事，共黨以最粗魯的措辭抗議，且極力讚揚芝加哥種族平等及越南和平會議，並抗議歌唱家珍·貝茲（Joan Baez）因在奧克蘭（Oakland）參與反戰爭遊行活動而被捕。

與美國恰成對比，比利時共黨把蘇俄捧成世界和平的堡壘，而不顧其秘密的機關報『比利時共黨新聞』（P. C. B. Informations）讚揚蘇俄援助古巴的事實。該報報導：『世界任何地方，不論在越南或近東，只要是與美國帝國主義作戰或攻擊其盟國者，都是使用蘇俄武器作戰或攻擊的；但在民族運動中，却很難發現來自蘇俄的武器』。比利時共黨主席賓尼爾訪問蘇俄以後，該報刊登其強調比利時共黨與蘇俄共黨意見一致的談話。共黨報紙與各地區慶祝布爾雪維克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成績平凡。關於此點，可從共黨本身報紙報導參加慶祝人數中見之：布魯塞爾：八〇〇人，安特華普：六〇〇人，根特：四五〇人，阿羅斯特（Alost）：三五〇人，馬林斯（Malines）：三〇〇人，夏里洛亞：五〇〇人，拉海斯特（La Hestre）：四〇〇人，海衣（Huy）：一〇〇人，固斯馬斯（Quemes）：三〇〇人。

這些數字，當然是估計過高，顯示出共黨之沒有同情者及同路人參加慶祝的弱點。

共黨拿蘇俄的經濟作為飽受工廠關門困擾的比利時之模範，同時對蘇俄的工資增加及稅捐減低大事渲染。蘇俄之縮短服兵役時間，亦拿來作為比利時對北大西洋公約應採取的政策。召開新共產黨世界會議的意見，一旦在『真理報』（Pravda）提出後，布魯塞爾全部共黨報紙立刻支持。對莫斯科舉行的十月革命五十週年閱兵典禮，極力描繪，而於蘇俄五十年的專制政治，則盡量推崇，認為是『五十年的人民權力』，而對史達林則隻字不提。

比利時共黨，對印尼共黨政變流產後所成立的印尼新政府，亦猛烈攻擊，並要它負謀殺衆多印尼共產黨員的責任。

在以色列與埃及的衝突中，比利時共黨袒護阿拉伯人，並支持『世界和

平理事會』的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呼籲。因為在比利時的猶太人也相當的多，所以比利時共黨不得不將其親阿拉伯的立場極顯露，同時將『在比利時的猶太人』及『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加以區別。比利時共黨袒護以色列共黨的親阿拉伯立場，以色列共黨企圖動搖以色列及其政府，非難以色列政府阻礙阿拉伯難民的遣回，以及對比利時若干共黨黨員所採之不當措施。比利時共黨這種態度的發展，與蘇俄報紙不謀而合：即抗議將阿拉伯人逐出加薩 (Gaza) 走廊；要求以色列部隊從佔領地撤退；袒護以色列共黨，該黨是主張與阿拉伯人和平共處的。

關於以前比利時同剛果的問題，比國共黨及報紙一致支持莫貝杜 (Moba) 總統，反對『外國傭兵』，對被綁架的杜森姆 (Tshombe) 則挑撥是非，同時攻擊漢姆爾外長之支持杜森姆。

這種情形，和它對東德的態度，恰成對照。比利時共黨支持南北韓的再統一；基於反美的基本立場，共黨始終是袒護古巴，以對抗美國的挑釁。關於伊朗，則集中非難伊王加冕典禮的豪華，並提及很久以前即已消失的杜德黨 (Toudah)，詆毀伊王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者的傀儡。

比利時共黨及其同情者的報紙，及因越南問題而進行的大部份示威遊行，且曾發出無數次的呼籲，要求立即和平，停止轟炸河內，發動捐血運動。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即宣傳要發動一次大規模的遊行，發動委員會名單中，除左傾社會黨的海斯曼斯 (Huysmans) 及羅林 (Rolin) 外，尚有羅馬天主教會紅衣主教卡典。各方對此遊行的成功程度估計不一，參加遊行人數大約有二萬至十萬人。關於越南的報導會，有些在很小的會議室舉行。在布魯塞爾天主教工人青年中央大樓舉行的，則由一位天主教教士會會員及魯汶天主教大學的一位教授為主講人。反對華盛頓五角大廈 (美國防部) 的遊行，獲得在布魯塞爾、安特華普、列日、根特，以及海外的東京、莫斯科、斯德哥爾摩、慕尼黑，及巴黎的響應與支持。在此場合中演說的，有魯汶大學教授侯達特 (Houtart)、羅凌 (Rolin) 及拉格斯 (Lagasse)。

在這些無數的遊行與小型示威中，共黨在各型企業中，分發了數以萬計的小冊及油印小本子。整個事情就是一股無窮無盡的紙片洪流。

運輸部部長巴特蘭 (Bertrand)、因訪問彼列多利亞 (Pretoria) 而受攻擊。

最後要指出的，是比利時共黨對中共的批評較少，而認為它是『官僚主義者』、『一元論者』及『孤立者』。在蘇俄與中共的鬥爭中，比利時共黨顯然是袒護莫斯科的。

六 結論

一、比利時共黨絲毫不差地遵行馬列主義及其政治目標。
二、比利時共黨保持對蘇俄共黨絕對忠誠的原則。
三、比利時共黨當其組織示威遊行，而能使非共黨同情份子參加時，則在理論及政策的宣傳方面，仍作若干保留。

四、在魯汶、根特，尤其是布魯塞爾，某些知識份子或學生團體有限的範圍內，共黨能獲得相當多的同情者之支援與合作。這些份子與各種委員會合作，如越南委員會等。且反對原子彈，要求希臘民主，並反對佛郎哥。一般而言，共產黨雖然不將其決議叫做『共產』而改稱『民主』，但非共黨羣衆亦無任何反應。在那慕爾 (Namur) 地區聯邦年度報告中，共黨書記指出：『雖然本黨有行為能力，但未能使非共黨各階層支持本黨各項活動』(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莫特 Motte 在那慕爾的報告)。共黨主席賓尼爾對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至十八日第八屆黨員大會報告說：『在社會黨中，有顯著的左傾趨向』。這當然是真的，但正如同歐洲煤鐵共同體的成立造成礦產工業危機一樣，這些都不是共黨的成功。這種主張純粹是無稽的。

在宣傳方面，無可否認的，共黨外圍若干團體及委員會獲致某些成就；而正如以上所言，在大多數場合，都是以相同名稱出現的。有若干與黨無甚關係的定期刊物，有時也會為某些共黨理論辯護。這些刊物，都是一部份或全部受馬克思主義所影響的。這些刊物中，有『新報』(De Nieuwe)，此報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以來，即縮小篇幅及張數。『騎士旗』(Het Pen-naen) 乃弗郎地民族主義者極端左傾的月報。『指針』(Richting) 乃布魯塞爾及其外圍弗郎地民主派的機關報。『弗郎地民族主義』是最近出版的，在各刊物中，其智識水準最高，是由共黨及其同情者，以及左傾社會黨份子所編輯的。整個說來，都是走共黨路線。

比利時共黨全國大會，有二四一位代表參加(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至十七日)。據執行委員會報告：參加代表中，有一九四位是社會黨工會會員，三位是基督教社會黨黨員，一位是自由進步黨工會會員。這一數字，與判斷共黨在工會的影響力無多大關聯，但從共黨在該年所採取的許多『行動』中，可以看出共黨在企業界及當地各種組織中，有很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在窩龍為然。